

很多陷入“头寸管理”骗局的人，并没有得到这个城市中流传过的任何财富机会。他们过着最普通的生活，之前没有运气或是没有能力搭上任何一班财富快车。这场投资骗局就像一枝幸运之神难得伸出的橄榄枝，看起来门槛很低，操作也非常简便，不需要多少资金，也不要求多高的专业性，他们太需要这样一个可以透进光来的窗口。

## 骗局

“应该邀请你去我家坐坐的，但实在是太脏了，因为本人是收破烂的。”魏伟发来微信消息，后面跟着一个害羞的表情。他的家在浙江丽水市遂昌县的一条老街上，是一套50多平方

米、分隔成3个房间的平房。

屋子里确实逼仄，堆满了瓶瓶罐罐，只留下一人宽的通道，连一张待客的凳子都没有。

门口还停着一辆三轮自行车，这是十几年前邻居家搬走时留下的，魏伟捡回来收拾收拾，还能用，就成了收废品时的工具。

魏伟原本打算不再收废品。他已经年过六十，头发全白了，腿脚也不好，走起路来有些颤抖。遂昌县城依山而建，地势不平坦，在县城里穿梭时，他常常要蹬着三轮车上坡，十分吃力。

有时候卖废品的人住在六楼，没有电梯，他得吭哧吭哧地爬上去，再背着一堆东西下楼。

但从2021年开始，魏伟不得不重操旧业，因为他失去了自己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十几万元积蓄。



《骗子》剧照

魏伟决定

拿出3万元试水。

一个月后果真提现了2000多元“收益”。

他决定追加投资。按照“Mark”软件的规定，每个账户最多只能投资5万元，魏伟便借来几位亲戚的身份证号开通账号，追加投资7万元，还说服其他几位朋友加入，自己成了群主。

“致富秘密”慢慢在县城里流传开来。

在本刊记者接触到的投资者里，有工厂女工、保洁员、超市收银员、退休教师，年龄从40多岁到70多岁不等。

2020年是这场“投资”影响规模最庞大的时候，这样的场景反复在县城里重现：清晨五六点，整个小城还没完全苏醒，一批行色匆匆的人已经骑着电动车上街。他们进入某栋大楼，在理事或群主租来的办公室里集中操作一番；大概半个小时后，又急匆匆从大楼里出来，出现在家里或是工作场合。一位阿姨记得，冬季时天还没亮，大家睡眠惺忪地顶着寒风来到“投资”办公室，却从没有过一句抱怨。

人们聊着最近的“收益”，畅想赚到一定数额后，就去翻新家里的老房子、给女儿置办嫁妆，或是带患癌症的父亲到大城市治病。



在遂昌这次虚拟货币诈骗里，中老年人成为受害的主要群体(Bloomberg/视觉中国 供图)

## 上钩

直到今天，许多受骗者依然无法讲清楚，这个曾经从他们口袋里掏走所有积蓄的“致富机会”究竟是什么样的。

只是骗术制作者的话术，总让他们觉得，这个“生意”与身边正在发生的大公司操作似曾相识，感觉“很有道理”。

最简单的说法是“刷单”。“头寸管理”的组织者声称，交易的是一款最新推出的虚拟货币，成交量小，需要投资者每4天买卖一次“冲流量”。魏伟把这理解为“就像拼多多一样，邀请新用户买东西，自己还能分到钱”，投资者所得的收益，就是刷单工资。如果面对的是稍微懂些理财知识的人，组织者的话术就会显得更专业一点，将炒币比喻为买股票，但这个平台是和买家站在一起的，

“会有特别的手段，能操控涨跌，吸引其他散户加入后‘割韭菜’，让投资者赚到足够多的钱”。

而2017年也确实是推出“虚拟货币投资”这套说辞的好时机。就在那一年年底，国际金融市场上比特币刚刚经历一波暴涨，2个月时间就从一枚5000美元上涨到将近2万美元。这股炒币的风潮也传进了遂昌县。城里一位关注虚拟货币

多年的受访者还记得当时身边人的疯狂，

“虚拟货币是24小时变动的，不像股票有下班时间。投资的人看准了一个币，晚上能通宵不睡觉，看着跌到谷底，就抄底进去，真有人一晚上挣了20万元”。

虽然县城人里真正懂“比特币”是什么的人不多，但关于高位涨跌的造富神话还是传进了城里的大街小巷。

72岁的黄阿姨告诉我，她是在买菜时，被同村一位大字不识的菜贩子推荐了虚拟货币，才跌入“头寸管理”的骗局。



(插图 :老牛)

人们也不是没有对所谓的“投资”产生过怀疑。参加完大会后，杨春秀回家借来朋友的笔记本电脑，一个键一个键地敲，在搜索引擎里输入“比特币”和“头寸管理”。她确实搜到了比特币暴涨的文章，还在几篇关于“头寸管理”的文章下方翻看了好几页评论，全都是正面的。

平台崩盘后，她恨恨地觉得，“骗子太厉害了，连搜索引擎都被收买了”。

这种层层拉人、抽成的形式，一开始让林超想到了“传销”。他是个生意人，从17岁就开始做买卖，至今已经30多年，也算见过些世面。他甚至亲历过传销骗局——2007年，他还在做收购毛笋的生意时，一位老乡打来电话，说河南

新乡有一场关于毛笋的生意招商会，如果签订合同，能挣一大笔钱。林超坐着火车摇摇晃晃到了新乡，被带到一栋大楼里。

门一打开，他就知道自己“掉进传销窝”。60平方米的房间里铺着榻榻米，二三十人盘腿坐着，最前方还有一个人站在黑板前讲课。

黑板上的图案就像一座金字塔，每一层都写着“羊”字，还用向上的箭头标注出了抽成比例。

讲课的人唾沫横飞，正在教大家如何在电话里说服亲戚朋友掏钱加入。

但“头寸管理”宣传的比特币“投资”，看起来又不像是一场标准的传销。“传销传销，总得传点什么东西吧？要不得把人扣起来逼着打电话吧？”林超心里有点拿不准，“这次的账号密码都在自己手里，又是自己在买币，还能出什么错吗？”

这个做了一辈子实业的生意人从没想到一种可能：所谓的交易所、交易平台和后台人员，其实都是“头寸管理”一手搭建的。



遂昌的城市发展建设模型（吴淑斌 摄）

遂昌县本来就不是个穷地方。它离义乌只有160公里，上个世纪80年代，最早

发  
现商  
机的人开  
始走出县城，去往  
这个如今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做生意。

那是第一批靠做实业富起来的人，如今人们谈论起“谁买了县城里最豪华的别墅”时，还是习惯说“在义乌做生意的大老板”。

即便是生活在农村的乡下人，也有自己的赚钱路子。遂昌最有名的农产品是竹笋和茶叶，不少当地人从2000年初就开始倒卖竹笋，从山上低价收购后，卖到其他县城的罐头厂。借着这两三年直播带货的风潮，农产品的市场又更大了一些。但这些机会，都比不上一场城市更新运动给县城带来财富想象的广度。

在本刊记者的采访中，几乎每个受访者都会提到2018年前后，城中最津津乐道的话题是各种“拆迁后一夜暴富”的故事。

那时候，高山川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500多平方米的麻将馆，放了30多张麻将桌。高山川的熟客里，有几位正是拆迁户。“沿街有一两个店面，还分到两三套新房子，都租出去，一年几十万收入，可安逸了。”高山川的言语间透露着羡慕，

“早知道我也应该买一套能拆迁的房子。人家的起跑线就赢你一大截了，我们从农村里出来的人，起跑线都不知道在哪儿。”

也有人抓住了这场大改造带来的机会。2019年，一位受访者发现县城边缘的一条街上，一片新楼盘已经封顶，但中间却还有一片农房区。

“不可能这样摆着，一定是要拆的。”他想了许多办法，“拼命去买了一块地”，盖了一小栋新楼房。

事实证明，这位生意人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——2020年初，这里果然等来了拆迁通知。

除去买地、建房的成本，林超还赚到了200多万元。

至今，房地产买卖依然是这里的热门行业，在县城主街道之一的北街，有一排一层平房店面，全挂着“房产中介”的招牌。



吴淑斌 摄

魏伟说，自己一生都在做苦力活，“命途多舛”。他把“舛”念成了“桀”的读音。40岁之前，他是捧着“铁饭碗”的轴承厂工人，过着虽不富裕但也循规蹈矩的日子。一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，在国企改革的下岗潮中，魏伟成了第一批下岗的人。他离婚早，当时家里还有年迈的父母和正在上学的儿子，只能找了个钢铁厂里

三班倒的工作，不上班时，  
就蹬三轮车收废品——

那些种类庞杂的旧书，很多是从别人卖掉的废品里淘出来，擦拭干净后摆上书架的。

参加“头  
寸管理”的“投资  
”之后，这个开书店梦想越来越清  
晰。

魏伟的打算是这样的：自己另外租一套房子住，把小平房简单装修，其中两个房间用来放书，另一个房间做成阅读室，供大家免费看书。他全心全意地投入到“炒币”中，特地买了6个手机，因为每4天买卖虚拟货币时，要在十几分钟内完成，他一人掌管着七八个账号，应付不过来，只能在理事办公室里请其他

人帮忙操作，收废品的工作也暂时被搁置了。

一方面因为有了更有希望的“事业”，另一方面，自己的“腿脚早就受不了了”。

这个美梦一直持续到了2020年的10月

。其实，大厦不是突然间倾覆的。如果信息稍微灵通一些，或是在网上检索相关的新闻，就可以看到在2020年8月，苏州、桐城等地的警方已经发出通告，提醒市民警惕“头寸管理多层次团队”。

遂昌县里也提前有了风声。8月份开始，有人陆续抽身。魏伟发展的一位“投资者”给他打电话，语气十分着急，要求把3万块钱本金取出来，至于赚来的利息，一分钱都不要了，“公安局工作的亲戚说，那都是骗人的”。魏伟找到上级理事退了3万块钱，交给那位“投资者”。退款时，理事安抚魏伟，“集团运作正常着呢”。

他相信了这套说辞，甚至在10月16日——平台关闭的前一天——还从儿子手里要了2万块钱追投。